

要素价格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宣烨*

摘要:本文从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视角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研究结论表明:要素价格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使工业部门优先获得要素安排,直接挤占和侵蚀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由要素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导致高端服务业有效需求受限,无法与制造业有效耦合,出现“需求抑制效应”和“融合断裂效应”;产能过剩逆向加剧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侵蚀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导致越过剩越扭曲的“棘轮效应”。本文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要素市场扭曲 产能过剩 生产性服务业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企业产品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也是技术创新、产品培育、产业孵化的重要依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层次高端、发展充分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力地支撑和引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制造化”模式已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2011年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2017达到51.6%。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服务业发展能否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备受关注(李平等,2017)。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服务业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谭洪波、郑江淮,2012),不仅比重指标落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结构滞后问题也尤为严重。2016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9.6%,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四个70%”^①的标准相去甚远。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不强、传统服务业部门增长带来的“脱实向虚”(江小涓,2011),都是中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会滞后于经济增长?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供需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来解释。供需因素强调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原因。张月友、刘志彪(2012)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间投入的增加,全社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提升,而供给方面的约束显得愈加明显,主要包括人力资本(Ciccone & Papaioannou, 2009)和技术创新(付宏等,2013)。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密切关系,江波、李美云(2012)和袁志刚、饶璨(2014)主要基于中国

* 宣烨,南京财经大学,邮政编码:210023,电子邮箱:xuanye2003@163.com。本文受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大国经济视域下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18VSI017)资助。感谢审稿人的中肯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基本可以用“四个70%”来概括,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到70%左右;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70%;经济增长的70%来自服务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70%”。

的经济背景,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脱节”的现状给予分析。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也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Eichengreen & Gupta, 2013;刘奕等,2017),主要包括政府干预(褚敏、靳涛,2013;宋凌云等,2013)、产业政策(梅国平、龚海林,2013;钟茂初等,2015)等,这都会阻碍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以上文献为本文揭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谜团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质态低端?难以与制造业形成有效的互动融合?已有文献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拟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一是考虑要素市场扭曲的因素。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历史问题,既与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有关,也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财政分权体制的逐步确立,地方官员为谋求政治晋升存在GDP锦标赛,使土地、资本、劳动力、能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偏向工业(江飞涛等,2012;陈艳莹、王二龙,2013),这些无形中挤压服务业的要素投入与发展空间。二是考虑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因素。前期由于政府较关注提高当地的GDP规模,采用了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鼓励快速低质的产业发展,这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负外部性和不可持续性。当前产业政策刺激了大量的企业对少数的政府偏好产业的集中投入,而企业自身的投资冲动又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程度(程俊杰,2016),形成实际产业的结构性问题。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剥离出来的专业化部门,其发展极大地依附于制造业的需求,而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现状导致企业提升核心业务的演化激励缺失,自身的“低”生产迂回度不仅会制约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量扩张,也会使需求集中在低端业务,无法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形成有效耦合。三是考虑要素市场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特殊关系。要素价格扭曲是引致行政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根源(皮建才,2008;江飞涛、曹建海,2009),政府通过其所掌握的各项要素定价权及其他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显著降低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投资及运行的关键性要素价格,产生“政府价格信号”式体制性产能过剩。因此,要素市场扭曲,一方面直接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另一方面通过低要素配置效率行业中的产能过剩,阻碍制造业中间投入部门的剥离演化,间接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不足。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建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并基于我国分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从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与制造业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为探寻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

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之一,虽然目前商品市场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改革明显滞后,一些基础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明显低于商品市场。起初,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向下,政府对要素市场进行扭曲操作和价格管制,通过压低要素价格降低投资成本,极大地刺激了企业的生产热情(林毅夫等,2001;黄益平、陶坤玉,2011)。可以说,要素价格管制在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到20世纪90年代,虽然产品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双轨制价格体系的并轨),但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受限于地方政府GDP锦标赛和官员任期与晋升压力,要素市场改革再次陷入停滞状态,进程极其缓慢。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的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市场都存在着各种行政扭曲,要素价格扭曲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张杰等,2011;陆铭等,2015),并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展。

(一)要素市场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机制

首先,在资本市场方面,服务业企业很难获得与工业企业平等的资金支持。在利率管制的金融体系下,由于缺乏市场化发展的相应制度,中央政府对金融中介的控制及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行为,造成金融资源配置被直接或间接干预,资本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被扭曲(Boyreau-De-

bray & Wei, 2005; Dollar & Wei, 2007)。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人力和技术密集型的属性,决定了行业内的企业多以小规模、轻资产类为主,不像工业企业具有大规模、高增长的特征。基于此,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工业因为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和 GDP 快速增长的需求而更受青睐,容易获得来自政府的信贷补贴和直接性资金安排;而生产性服务业普遍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土地或房产等资产,又大多是非国有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对其贷款的态度更加谨慎,手续更加繁琐。这些因素进一步演化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极易受到来自“所有制”“规模”等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在获取资本要素时,相对于工业企业处于劣势地位(陈艳莹、王二龙, 2013; 谭洪波, 2015)。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人口红利下的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资谈判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低工资政策引发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扩张,扩大了对一般性劳动力的需求,挤占了人力资本发展空间,侵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人力资本根基。加之,城乡与区域之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动力供给,使我国的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保持竞争优势(陆铭等, 2015),并吸引政府将控制的土地、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不断流向该行业,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低工资水平的维持,也降低了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预期,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既无法满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人力资本要素投入需求,也严重制约了通过科技研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行业发展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优化、质态提升。

再次,在土地市场方面,工业用地与服务业用地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使土地资源明显偏向高价格的工业,并带动其他生产要素流入工业,挤占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2015年,国有建设用地中工矿仓储用地供应量是商务用地供应量的3.4倍,但后者的价格是前者的近9倍。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激励及晋升压力下,凭借其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通过“划拨”方式向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工业用地,表现出极强的“土地引资”动机(张莉等, 2013)。除仓储物流业的用地属于工业用地外,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用地多属于商业用地。商业用地大多采取“招拍挂”形式,从而工业用地的价格远远低于商业用地^①。科研、勘察、研发设计、检查监测、技术推广、环境评估与监测等行业的用地虽然属于科技研发用地,政府同样有一定优惠,但与工业用地价格相比,差距依旧十分明显。比如,上海规定通用类研发用地出让价不得低于相同地段办公用途基准地价的70%,是工业基准地价的近12倍。两者间土地价格的“行业歧视”,激发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也跟随流向工业部门,不断挤占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增加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成本,并形成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误置效应”。

综上,要素价格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使生产性服务业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获取方面明显劣于工业部门,引发了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投入的“挤出效应”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误置效应”。

(二)要素市场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间接影响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年均投资增速分别为25%和24%。其中,大量投资涌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纺织、金属、造纸等基础行业,使这些行业的产能快速增加。虽然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但中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基础行业投资仍然保持较快增速,最终导致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制定和实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政策,包括五年规划、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等。这些政策刺激了在某些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影响的重点行业的投资。过剩的产能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间接影响。

^①2015年,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商服用地平均价格6729元/平方米,而工业用地价格只有760元/平方米,前者是后者的近9倍。

一方面,由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产能过剩一般都徘徊在低端生产制造环节,无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有效需求。正如前文所述,政府对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偏向工业的行政干预,使我国工业能够在过去30年维持较低的生产成本并赢得竞争优势。这虽然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转轨时期的双轨制下,导致了大量的行政性重复建设,造成部分产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并最终形成体制性产能过剩(皮建才,2008;江飞涛、曹建海,2009)。与周期性或结构性产能过剩不同,由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产能过剩缺乏“自愈”机制,这使过剩行业内的企业无法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徘徊在低端生产制造环节、低端价值链环节,并在政治需要下造成大量“僵尸企业”。这些企业自身的“低”生产迂回度和对技术投入的排斥性,不仅会制约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量扩张,也会使生产性服务需求集中在低端业务,无法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形成有效耦合和相互促进,损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的“技能优势”和“技能深化”(Buera & Kaboski,2012),制约生产性服务业质态提升、结构优化,导致“需求抑制效应”和“融合断裂效应”。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的持续存在又会通过要素扭曲效应,进一步加剧对生产性服务业要素供给的侵蚀。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升级,基本前提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足够完善,价格信号能正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边际生产率。然而,在扭曲的要素市场环境下,由于过剩产业内的企业大多属于投资大、规模大的企业,出于GDP竞争、“数量型”赶超以及保障就业、社会维稳等动机考虑,各级政府依旧持续对这类企业进行补贴,以防止企业退出市场(程俊杰、刘志彪,2015)。这不仅导致过剩产能部门长期占用生产要素资源,还会因为越过剩越倾斜的“棘轮效应”加剧要素价格扭曲,进一步侵蚀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

综上,由要素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有效需求受限,无法与制造业有效耦合,出现“需求抑制效应”和“融合断裂效应”;同时,产能过剩逆向加剧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侵蚀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供给,导致越过剩价格越扭曲的“棘轮效应”。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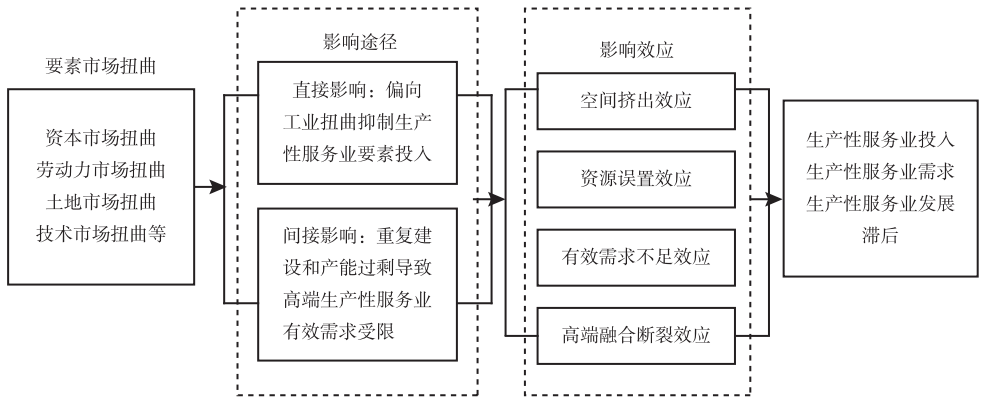


图1 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机理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特征性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的核心逻辑思路,即要素市场偏向工业的扭曲不仅直接挤占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还会因为扭曲导致行政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从而侵蚀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有效需求,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依据前文的理论机制阐述,建立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

$$SD_{it} = \alpha_0 + \alpha_1 FD_{it} + \alpha_2 FD_{it} \cdot CU_{it} + \sum_{k=1}^n \alpha_k \cdot X_{itk} + \mu_i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地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和时间; SD_{it} 为各地区服务业发展程度, FD_{it} 为 i 地区第 t 年的要素扭曲程度, CU_{it} 为各地区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情况(100-产能利用率), X_{itk} 为影响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控制变量;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是噪声误差,由经济系统中不可控因素冲击而成,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 $\alpha_0, \alpha_1, \alpha_2 \dots$ 为待估参数, α_1 考察了要素市场偏向工业性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直接影响, α_2 考察了要素市场偏向工业性扭曲通过引致制造业产能过剩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的间接影响。

现有文献中有关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其中起源性的工作一般从分工和服务外部化角度进行解释(陈宪、黄健锋,2014),认为服务业的增长是分工深化引起对服务部门的中间需求扩张。Buera & Kaboski(2012)在一个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单部门模型框架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严重依赖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规模 and 专业化程度。除此以外,一些学者从城市化、法律环境、人力资本积累、国际分工等角度阐述了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Eschenbach & Hoekman,2005; Holmes & Stevens,2005;宣烨等,2015)。根据已有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模型(1)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含义分别说明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RGDP、RGDP²)。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服务业发展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非线性门槛效应关系:当人均GDP低于阈值时,服务业发展一般相对迟缓;而越过该阈值时,服务业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本文引入人均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

制造业结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第一,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HI)。王文、孙早(2017)以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所做的经验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需求程度的提高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其基于假设:更加高级的产业将使用更大规模和比重的创新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因此,高技术产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越高,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大。第二,制造业部门的平均规模(AS)。其基于假设: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过程中服务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同时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内部化中间服务品。因此,制造业部门的平均规模对当地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是促进还是阻碍,并不能确定,取决于生产中服务品的投入量及中间投入服务品的外包程度。

城市化水平(UB)。服务业具有大城市集群化特征,商务服务、科技研发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部分商业服务倾向于集中在大城市,而一般城市与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则主要分布制造业及基本消费服务业(宣烨、余泳泽,2014),因此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是影响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化水平(UB)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

人力资本水平(HDI)。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型特征,因此,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要素投入。人力资本水平(HDI)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服务业开放程度(OPEN)。一般而言,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会因为地方保护而不利于企业之间展开竞争,进而降低企业的创新动力并抑制由竞争带来的一系列溢出效应。同时,因为对外封闭,无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取跨国公司发包的中间服务业务(Pilat & Wöfl,2005)。服务业开放程度(OPEN)采用服务业FDI流入量占当年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

知识产权保护(IPP)。生产性服务业一般具有知识密集型特征,其核心竞争力更多地是包含在服务中的技术、知识和创意,其不仅对知识产权保护较为敏感,也更加需要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制度性环境支撑(Hipp & Grupp,2005)。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能力、增长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Maskus,2010)。本文选取樊纲等(2011)“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来代表我国不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二)数据来源及核心变量处理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区间为2001—2011年各年度分地区数据,所选取的省级层面是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省级层面的经济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年鉴。

按照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定义与外延特征,参考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与制造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被解释变量各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SD)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GDP的比重来表示。

2. 核心变量处理。要素市场扭曲指数。传统的前沿分析法和基于生产函数框架的要素错配测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张杰(2011)研究认为,基于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商品市场化进程的现状,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我国省级区域之间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自身因素的差异所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直接测算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具有信息失真问题。基于此,他构造了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即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地区的产品市场发育指数-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地区的总体市场发育指数-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地区的总体市场发育指数。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中国省际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总体市场的市场化发育程度的相对差异性。尽管如此,该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却低估了地区间的相对扭曲程度(林伯强、杜克锐,2013),因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产品市场和总体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林伯强、杜克锐(2013)基于标杆分析方法的相对差距指数测算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即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 $u_i = [\max(\text{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_i) - \text{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_i] / \max(\text{地区的要素市场发育指数}_i)$ 。该指数的优点在于既能体现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相对差异,也能反映出地区要素市场随时间变化程度。本文参考该方法,各省产品市场发育指数和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数据均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王小鲁等,2017)。

分地区的产能利用率。目前测度产能利用率比较流行的方法包括函数法和DEA法。函数法认为“最大生产能力是厂商在均衡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该方法一般通过设定生产函数、利润函数或者成本函数,测算产能利用率(Lazkano,2008;Pascoe & Tingley,2006;韩国高等,2011)。Fare et al (1989)开创性地构建了测算生产能力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其隐含的生产能力是指厂商利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存量购买最大化的设备并且设备达到充分利用时的生产能力。因为不必对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进行检验假设,该方法被后来研究者广泛使用(Kirkley et al,2002;Karagiannis,2013;董敏杰等,2015)。由于中国特色的经济背景和非市场因素的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生产能力并不完全适用,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采用技术意义上的生产能力,即DEA方法。

Y 表示在给定固定投入 I 和可变投入 V 下的有效产出, y 为实际产出,因为存在技术效率 TE 的制约,因此 $y = TE \cdot Y(I, V)$ 。

产能利用率 CU 为实际产出与有效产出之比:

$$CU = y/Y = TE \cdot Y(I, V)/Y(F) = TE \cdot EU \tag{2}$$

其中, $EU = Y(F, V)/Y(F)$,为可变投入约束下的设备最大化生产能力的利用率。

式(2)的有效产出函数 $Y(I, V)$ 和 $Y(F)$,利用DEA方法进行测算:

$$\begin{aligned} \text{Max } Y_j^t(F_j^t, V_j^t) &= \sum_{i=1}^n \lambda_i^t y_i^t \\ \text{s. t. } \sum_{i=1}^n \lambda_i^t y_i^t &\geq y_j^t, \sum_{i=1}^n \lambda_i^t F_i^t \leq F_j^t, \sum_{i=1}^n \lambda_i^t V_i^t \leq V_j^t, \sum_{i=1}^n \lambda_i^t = 1, \lambda_i^t \geq 0 \end{aligned} \tag{3}$$

$$\begin{aligned} \text{Max } Y_j^t(F_j^t) &= \sum_{i=1}^n \lambda_i^t y_i^t \\ \text{s. t. } \sum_{i=1}^n \lambda_i^t y_i^t &\geq y_j^t, \sum_{i=1}^n \lambda_i^t F_i^t \leq F_j^t, \sum_{i=1}^n \lambda_i^t = 1, \lambda_i^t \geq 0 \end{aligned} \tag{4}$$

式(3)中 $Y_j^t(F_j^t, V_j^t)$ 表示 t 时期被考察单元 j 在给定生产技术下的有效产出,其中, F_j^t 和 V_j^t 分别是被考察单元 j 的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 λ_i^t 是权重向量, n 为生产单位个数。约束条件 $\sum_{i=1}^n \lambda_i^t F_i^t \leq F_j^t$ 与

$\sum_{i=1}^n \lambda_i V_i \leq V_j$ 分别代表被考察生产单位 i 的固定投入与可变投入大于有效的固定投入与可变投入, $\sum_{i=1}^n \lambda_i y_i \geq y_j$ 代表被考察生产单元 i 的实际产出要小于有效产出, 三个约束条件实际表示单元生产组合式位于可能生产集之内。 $\sum_{i=1}^n \lambda_i = 1$ 代表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可变的。

本文在测算产能利用率时, 生产函数的产出变量采用工业总产值, 选取各省市轻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总产值。投入变量包括固定资本, 采用永续盘存法, $K_t = K_{t-1}(1 - \delta_t) + I_t/P_t$, 其中, K_{t-1} 和 K_t 分别代表 $t-1$ 时期和 t 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因为没有细分行业的固定资产形成额, 本文采用相邻两年的固定资产原价差值作为替代变量, 使用 2000 年固定资产原价与累积折旧的差值代表基期资本存量。 δ_t 为折旧率, 用本年固定资产折旧与上年固定资产原价之比作为折旧率。 P_t 为投资品价格指数, 用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各行业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投入变量包括劳动投入, 选取各行业年末从业人员数; 中间品投入, 用(工业总产值 - 工业增加值 + 应交增值税)/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进行测算^①。

在得到分省市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后, 通过加总的方式得到一个地区总和的产能利用率, 即:

$$CU_r = \sum_j y_{r,j} / \sum_j Y_{r,j} (F_{r,j}) \quad (5)$$

(三)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分析

整体上我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其中, 东部地区的数值不仅最小(表明扭曲程度最低), 也下降得最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相当, 西部虽然略高, 但下降速度更快一点。因此, 从标准差数值来看,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2001—2011 年整体上工业产能利用率平均值最高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 最低的省市为新疆、山西、陕西、宁夏和贵州。东、中、西部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差异, 东部地区平均值为 74.3%, 而西部地区只有 54.2%。从时间趋势来看, 2008 年是分水岭, 之前平均产能利用率达到 78.8%, 之后却急速下降, 到最低值只有 57.2%。

四、实证检验及其分析

要素市场扭曲对工业的偏向, 一方面, 会挤压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 另一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越是滞后, 经济效益越是低下, 地方政府越不会对其重视而进行政策倾斜, 因此地方政府会更加青睐工业, 使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要素市场扭曲指数两者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同时, 由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较多, 实证分析时很难将所有因素都纳入解释变量, 这会导致遗漏变量的影响计入残差项, 引起内生性问题。因此, 本文采用 SYS-GMM 方法, 该方法不仅能够消除个体非观测效应和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变量, 从而部分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还能够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 从而可以消除自变量与因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 Hansen 检验识别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检验残差项的非自相关假设。式(1)的线性动态面板模型如下所示:

$$SD_{it} = \alpha_0 SD_{it-1} + \alpha_1 FD_{it} + \alpha_2 FD_{it} \cdot CU_{it} + \sum_{k=1}^n \alpha_k \cdot X_{itk} + \mu_i + \epsilon_{it} \quad (6)$$

^①2007 年之后, 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数据, 有些省份虽在 2007 年后还继续公布工业增加值, 但在 2012 年后都基本停止。我们参考董敏杰等(2015)从各省市统计年鉴获取部分数据, 对于仍缺失的数据, 假设 2008—2011 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为 2001—2007 年的平均增加值率, 然后与相应年份的工业总产值相乘得到, 因此, 实证样本时序为 2001—2011 年。在之后的稳健性分析中, 我们通过替换产能利用率指标, 将分析时序延长, 并且通过结果对比, 可以发现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系统 GMM 估计方法需要满足矩条件的过度识别约束以保证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的相关性。本部分将通过计量方程(1)的回归检验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 1 所示。Arellano-Bond 统计量 AR(2)的 P 值均大于 0.1,说明系统 GMM 估计量具备一致性,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表 1 中,Hansen J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均在 0.1 以上,未拒绝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这说明所选工具变量在整体上是合理有效的。因此,模型设定较合理,估计结果可靠性较强。

表 1 中,模型(1)给出了只包含经济发展水平(引入人均 GDP 和人均 GDP 平方项)单一控制变量下要素市场扭曲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模型(2)则进一步引入制造业结构、城市化、人力资本水平、服务业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他控制变量。模型(3)和模型(4),在之前的基础上,加入过剩产能指标 CU 以及要素市场扭曲与过剩产能指标的交互性,检验要素市场扭曲、过剩产能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均表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要素市场扭曲越严重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越滞后。这体现出在目前地区财政分权的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官员迫于晋升压力,偏爱制造业,不仅投资规模较大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被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也大量涌入市场(刘竹青、佟家栋,2017)。政府通过对能源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干预,持续变相补贴制造业企业,致使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由政府主导的要素市场处于劣势,无法公平和充足地获得要素供给,长期发展预期被降低,其创新、投资以及市场扩张的积极性被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被限制。可见,要素市场扭曲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比表 1 中模型(1)(2)与模型(3)~(6)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加入产能过剩变量后,要素市场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负面影响系数值变得更大,这证实了理论机制中的论述,即产能过剩又会通过要素扭曲效应,进一步加剧对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侵蚀,即由于“越过剩越扭曲”的“棘轮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在要素市场尚未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会因为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困局,发展更加缓慢和滞后。

表 1 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SD(-1)	1.045*** (21.10)	1.173*** (24.56)	0.970*** (11.11)	0.960*** (12.76)	1.118*** (24.99)	1.177*** (15.11)
lnFD (要素市场扭曲度)	-0.032** (-2.42)	-0.041** (-2.01)	-0.047** (-2.26)	-0.035** (-2.09)	-0.033* (-1.77)	-0.041** (-2.01)
lnCU (过剩产能)			-0.111 (-0.88)	-0.083* (-1.89)	-0.081 (-1.29)	-0.063* (-2.02)
lnFD · lnCU				-0.0041** (2.09)	-0.0087** (2.11)	-0.0031* (-1.71)
T · lnCU					-0.066*** (-3.44)	-0.081*** (-3.89)
T · lnFD · lnCU						-0.0088*** (-6.77)
lnRGDP (人均 GDP)	0.134*** (3.22)	0.111*** (3.79)	0.137** (2.24)	0.167*** (3.99)	0.113*** (2.99)	0.295*** (3.11)
(lnRGDP) ²	-0.023*** (-3.99)	-0.033 (-1.11)	-0.022** (-2.26)	-0.029** (-2.25)	-0.020*** (-3.11)	-0.016** (-2.22)
Hi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0.022* (1.78)	0.033** (1.99)	0.082 (1.31)	0.021 (1.22)	0.162* (1.75)
As (制造业平均规模)		0.332 (0.67)	0.221 (0.29)	0.0812 (0.58)	0.077 (0.21)	0.028 (0.22)
lnUB (城市化)		0.099*** (3.08)	0.117*** (3.71)	0.067*** (5.33)	0.098** (2.11)	0.0164*** (3.74)

续表 1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HDI (人力资本水平)		0.019*** (9.00)	0.022*** (6.33)	0.033*** (3.11)	0.018* (1.99)	0.0295** (0.0150)
lnOPEN (服务业开放程度)		-0.0288 (-0.19)	0.021 (0.83)	0.081 (0.11)	0.027 (0.51)	0.0333 (0.0371)
lnIPP (知识产权保护)		0.023 (0.72)	0.029* (1.90)	-0.099 (0.22)	0.041* (1.88)	-0.017 (-0.76)
AR(2)	0.451 (0.48)	0.942 (0.51)	0.600 (0.47)	0.834 (0.66)	0.691 (0.53)	0.424 (0.20)
Hansen J	0.771 (0.33)	0.981 (0.41)	0.380 (0.32)	0.579 (0.61)	0.417 (0.78)	0.622 (0.4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变量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Z值;AR(2)、Hansen J检验结果括号内为P值。以下各表同。

通过对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发现,2011年,28类制造业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1.12%,其中原料类重工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较低,如非金属矿物制品(水泥、玻璃等)、黑色金属冶炼(钢铁)、金属制品以及橡胶制品,低于制造业整体平均值,服装、纺织、皮革等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轻工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排名较为靠后^①。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能过剩,尤其是2008年后的急剧下滑,一方面,显然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属于市场条件下出现的生产能力相对需求过剩;另一方面,存在需求升级下的结构性过剩。由于国内消费市场不断由低端、低附加值产品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转换,在此期间,部分轻工行业未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及时升级调整,形成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共存的现象。而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下,多晶硅、光伏电池、风能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则更多的是因为体制机制缺陷扭曲企业投资导致的系统性产能过剩(江飞涛,2014)。这些行业的技术门槛较低但又属于大规模投资,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采用土地优惠、信贷支持、降低能源价格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刺激企业过度产能投资,使要素市场扭曲偏向工业行业(谭洪波,2015)。模型(4)中,要素市场扭曲与产能过剩的交互项显示出稳定的显著性,表明由体制机制缺陷扭曲企业投资导致的系统性产能过剩是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企业依赖政府的政策补贴,虽然能够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持续生存,但低下的生产效率及保持现状的短视预期,并不能激发其对高端服务业的内在需求,长期低端业务的需求压制了生产性服务业收入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交互项系数值为负表明要素市场扭曲越是严重,产能过剩的现状越不利用各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2008年前后产能利用率的均值分别是81.08%和69.96%,差异非常明显;2008年之前,产能利用率虽有一定的下滑,但基本维持在81%~92%的区间水平,但2008年之后表现出持续下滑。在式(1)的右侧加入乘积项($T \cdot CU$)和($T \cdot FD \cdot CU$),考察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前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乘积项($T \cdot CU$)和乘积项($T \cdot FD \cdot CU$)的系数值均为正,说明2008年后过剩产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更大,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产能过剩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在2008年后更加明显。控制变量的结果中,对外开放程度一直没有显示出预期的正向显著性,一方面,可能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还不充分,金融、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依旧严格;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国服务业渐进式的有序开放中,虽然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从2012年的583.8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63.7亿美元,增长了48%,但始终集中于房地产领域的现象并没有改变,2016年房地产FDI占到全部服务业FDI的23.4%。

理论机制部分的分析告诉我们,当要素市场扭曲导致体制性产能过剩时,由于高端融合断裂效

^①将制造业内部行业结果分为轻工和重工制造业,2004年之前一直是轻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较高,2008年之后,轻重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出现明显下滑,但轻工制造业下滑的幅度更大。

应,对需要更多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投入的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加不利。表2中,通过将生产性服务业区分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信息传输与软件技术服务业、科技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和一般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进一步深入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对服务业异质性的影响。从一般性统计数据看,201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就业总人口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为9.64%,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15%。在服务业最发达的北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口占生产性服务业的55.68%,而比重最低的宁夏只有1.88%,可见区域间的差距很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地区间的极度分化,使对高端与一般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别讨论显得额外有意义。

表2的结果显示出与理论机制中假设的一致性,相对于一般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受到要素市场扭曲及产能过剩的影响更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更加密切的互动耦合关系,被认为是重塑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要牵引,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一些领域投资过剩严重,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投资严重短缺。因此,无论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都需要融入制度创新,实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同时,对照表1,我们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结构升级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集的特征更加吻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更大,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实现制造链和服务链的交互融合(Ljungwall & Tingvall, 2015)。

表2 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不同层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一般生产性服务业		
$SD(-1)$	1.073*** (10.28)	1.012*** (12.98)	0.952*** (100.22)	0.981*** (28.11)	0.982*** (29.01)	1.069*** (47.22)
$\ln FD$ (要素市场扭曲度)	-0.077** (-10.88)	-0.078*** (-10.87)	-0.083*** (-10.04)	-0.041*** (-12.79)	-0.043*** (-10.11)	-0.046*** (-10.21)
$\ln CU$ (过剩产能)		-0.0260 (0.0325)	-0.0216 (0.0605)		-0.0118 (0.0151)	-0.0151 (0.0206)
$\ln FD \cdot \ln CU$		0.0838*** (0.0342)	0.0873*** (0.0355)		0.0163 (0.0284)	0.0643 (0.0529)
$T \cdot \ln CU$			0.0450** (0.0211)			0.0411 (0.0465)
$T \cdot \ln FD \cdot \ln CU$			0.0162*** (0.00283)			0.0174 (0.0123)
$\ln RGDP$ (人均GDP)	0.195*** (7.02)	0.233*** (5.68)	0.221*** (6.21)	0.119*** (6.11)	0.120*** (4.08)	0.145*** (5.72)
$(\ln RGDP)^2$	-0.019** (-2.11)	-0.018*** (-4.08)	-0.023*** (-6.52)	-0.011*** (-11.85)	-0.022*** (-25.27)	-0.023*** (47.86)
H_i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0.067*** (3.44)	0.087** (2.22)	0.068*** (3.11)	0.034* (1.79)	0.015 (0.82)	0.022 (0.91)
A_s (制造业平均规模)	0.043* (1.88)	0.015 (1.02)	0.022* (1.91)	0.037 (0.11)	0.079 (0.34)	0.071 (0.52)
$\ln UB$ (城市化)	0.119*** (3.99)	0.180*** (2.81)	0.074 (1.27)	0.118* (1.90)	0.093 (0.52)	0.040 (0.58)
$\ln HDI$ (人力资本水平)	0.022 (0.31)	0.087* (1.91)	0.062 (0.29)	0.048 (0.86)	0.031 (0.34)	0.026 (0.30)
$\ln OPEN$ (开放程度)	0.061 (1.35)	0.087 (0.44)	-0.032 (-0.32)	0.131** (2.25)	0.139** (2.17)	0.151*** (6.37)

续表 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一般生产性服务业			
lnIPP (知识产权保护)	0.029 (0.11)	0.017 (1.26)	0.021 (1.08)	0.011 (0.34)	0.030 (0.45)	0.026** (2.08)
AR(2)	0.891 (0.44)	0.910 (0.22)	0.773 (0.17)	0.661 (0.54)	0.845 (0.53)	0.815 (0.92)
Hansen J	0.331 (0.81)	2.822 (1.00)	0.773 (0.21)	1.942 (0.91)	1.352 (0.21)	1.533 (0.22)

注：***、**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变量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 Z 值；AR(2)、Hansen J 统计量括号内为 P 值。

五、稳健性检验

关于产能过剩的界定，学术界更强调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即从供给角度给出解释。实际上，产能过剩是“供大于求”的一种市场表现，也可以从需求侧对其进行刻画。上文已经利用 DEA 方法从生产侧进行了产能利用率的测算，为了得到更加稳定的结果，下面本文将构建消费侧的产能利用率，采用工业销售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进行衡量。同时，该方法可将本文的实证分析时序有效延长至 2016 年。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要素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又进一步深化了其中的阻碍力量，这与前文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基本思想和上述结论。

表 3 稳定性检验：需求侧产能利用率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SD(-1)	0.693*** (9.78)	0.612*** (9.32)	0.656*** (9.32)	0.647*** (9.66)	0.502*** (10.26)	0.499*** (9.41)
lnFD (要素市场扭曲度)	-0.028** (-2.21)	-0.026*** (-3.60)	-0.014* (-1.90)	-0.053* (-2.42)	-0.039*** (-3.77)	-0.040** (-2.01)
lnCU (过剩产能)			-0.323*** (-2.66)	-0.313 (-0.94)	-0.371** (2.51)	-0.317 (-0.89)
lnFD · lnCU				-0.0041** (2.09)	-0.0087** (2.11)	-0.0031* (-1.71)
T · lnCU					-0.049** (-2.55)	-0.054*** (-2.89)
T · lnFD · lnCU						-0.008** (-2.13)
lnRGDP (人均 GDP)	0.329*** (2.66)	0.371** (2.51)	0.699*** (8.24)	0.594*** (11.56)	0.371** (2.51)	0.281** (2.17)
(lnRGDP) ²	-0.071*** (-3.20)	-0.042*** (-3.71)	-0.059 (-1.56)	-0.023** (-2.77)	-0.038 (-0.77)	-0.047** (-2.76)
Hi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		0.073 (1.04)	0.053 (1.05)	0.178 (1.61)	0.186* (2.22)	0.134* (1.95)
As (制造业平均规模)		0.049 (1.11)	0.036** (2.36)	0.072*** (3.82)	0.059*** (3.14)	0.057*** (3.02)
lnUB (城市化)		-0.085 (-1.08)	-0.067 (-0.46)	-0.061 (-0.41)	-0.076 (-0.74)	-0.054 (-0.74)
lnHDI (人力资本水平)		0.84*** (4.97)	0.47*** (6.56)	0.46*** (6.37)	1.05*** (4.46)	1.00*** (4.25)
lnOPEN (开放程度)		-0.007 (-0.13)	0.014 (0.67)	0.016 (0.68)	0.059 (1.03)	0.057 (1.00)

续表 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IPP (知识产权保护)		0.032 (0.79)	0.047 (0.23)	0.052 (0.16)	-0.016 (-1.09)	-0.014 (-1.00)
AR(2)	0.203 (0.42)	0.887 (0.66)	0.447 (0.47)	0.783 (0.77)	0.454 (0.33)	0.157 (0.14)
Hansen J	0.885 (-0.367)	0.840 (-0.772)	0.540 (-0.300)	0.789 (-0.517)	0.708 (-0.631)	0.661 (-0.352)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Z统计量;AR(2)和Hansen J统计量括号内为P值。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实出发,认为要素市场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之间存在直接和间接联系,以此为基础进行机理推导和实证分析,为探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阻碍因素提供一个补充性的研究视角。主要研究结论是:(1)要素价格的制度性和政策扭曲,使制造业部门优先获得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安排,从而直接挤占和侵蚀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2)由要素市场扭曲所造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导致制造业企业提升核心业务的演化激励缺失,制造业自身的“低”生产迂回度不仅会制约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量扩张,也会使需求集中在低端业务,无法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制造业,形成两者有效耦合。(3)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充分的情况下,产能过剩还会因为越过剩越倾斜的“棘轮效应”进一步强化要素价格扭曲,加剧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要素供给的侵蚀。

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原因的探讨,虽然现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但简单的需求不足和供给缺失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本文基于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深入考察,揭示了要素市场扭曲、产能过剩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机理和路径,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矫正要素市场扭曲。应建立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和以市场供求而不是政府指令为基础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的体制性障碍,促进资金、人力、技术、土地等要素的流动,以便于生产性服务业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与制造业拥有平等的获取生产要素资源的机会。

二是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环境。进一步破除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玻璃门”“弹簧门”等隐形障碍,逐个梳理并清除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和准入设置的不合理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鼓励和引导各类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多元经济主体参与的充分竞争格局。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服务贸易以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各类经济主体同等对待、一视同仁。落实各项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扶持互联网创业等新兴业态,通过必要的政策杠杆为中小生产性服务企业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适当引入国外服务提供者参与竞争,依据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密集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鼓励外资进入知识密集高、产业带动力强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释放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三是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与政府推动并重,化解过剩产能。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单纯依托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化解过剩产能困难大、进程缓慢。在强调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加强调发挥法治化手段与政府推动的作用,既要依靠法治化手段,解决过剩产能责任主体不作为的问题;又要政府出台更加得力政策,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通过化解过剩产能,释放要素资源,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中高端服务需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层次升级、质量提升。

四是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供给。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艰难,尽管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偏低,没有有效发挥对技术创新、产品培育、产业孵化的引领性作用,进

而陷入了“低端制造下的低生产性服务需求”“低层次生产性服务业下的低端制造”循环。应将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供给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强调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层级提升,而不是仅仅强调规模、比重,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体系质量,显著增强我国制造业质量优势,推动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参考文献:

- 陈宪 黄建锋,2014:《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10期。
- 陈艳莹 王二龙,2013:《要素市场扭曲、双重抑制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 程俊杰,2016:《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发生机制研究——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财经科学》第5期。
- 程俊杰 刘志彪,2015:《产能过剩、要素扭曲与经济波动——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家》第11期。
- 褚敏 靳涛,2013:《为什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步履迟缓——基于地方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垄断双重影响的探究》,《财贸经济》第3期。
- 董敏杰 梁泳梅 张其仔,2015:《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第1期。
-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 付宏 毛蕴诗 宋来胜,2013:《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韩国高等,2011:《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 黄益平 陶坤玉,2011:《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与对策:要素市场扭曲的角色》,《新金融》第6期。
- 江波 李美云,2012:《生产服务业出口贸易、创新与生产率提升:理论与实证》,《财经研究》第7期。
- 江飞涛 曹建海,2009:《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重复建设形成机理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江飞涛等,2012:《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 江飞涛 武鹏 李晓萍,2014:《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 江小涓,2011:《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
- 李平 付一夫 张艳芳,2017:《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林毅夫 刘培林,2001:《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第9期。
- 刘奕 夏杰长 李垚,2017:《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 刘竹青 佟家栋,2017:《要素市场扭曲、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关系》,《世界经济》第12期。
- 陆铭 张航 梁文泉,2015:《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梅国平 龚海林,201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研究》,《经济经纬》第2期。
- 皮建才,2008:《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经济研究》第3期。
- 宋凌云 王贤彬 徐现祥,2013:《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学(季刊)》第1期。
- 谭洪波,2015:《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12期。
- 谭洪波 郑江淮,201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 王文 孙早,2017:《制造业需求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财贸经济》第7期。
- 王小鲁 樊纲 朱恒鹏,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经济科学出版社。
- 宣烨 徐圆 宣思源,2015:《内需驱动与服务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母市场效应”的研究》,《财贸经济》第5期。
- 宣烨 余泳泽,2014:《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38城市的经验分析》,《产业经济研究》第3期。
- 袁志刚 饶璨,2014:《全球化与中国生产服务业发展——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
- 张杰 周晓艳 李勇,2011:《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经济研究》第8期。
- 张莉 高元骅 徐现祥,2013:《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第12期。
- 张月友 刘志彪,2012:《消费者偏好与中国服务业发展难题——一般均衡框架下的证据》,《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钟茂初 李梦洁 杜威剑,2015:《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第8期。
- Boyreau-Debray, G. & S. Wei(2005), “Pitfalls of a state-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 The case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214.

- Buera, F. J. & J. P. Kaboski(2012),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6):2540—2560.
- Ciccone, A. & E. Papaioannou(2009), "Human capital,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n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1):66—82.
- Dollar, D. & S. Wei(2007), "Das (wasted) Kapital: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03.
- Eichengreen, B. & P. Gupta(2013), "The two waves of service sector growth", *Oxford Economics Papers* 65(1):96—123.
- Eschenbach, F. & B. Hoekman(2005), "Services policy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1990—2004",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663.
- Fare, R. et al(1989), "Measuring plant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0(3):655—666.
- Hipp, C. & H. Grupp(2005), "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The demand for service-specific innovation measurement concepts and typologies", *Research Policy* 34(4):517—535.
- Holmes, T. & J. Stevens(2005), "Does home market size matter for the patter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5(2):489—505.
- Karagiannis, R. (2013), "A system-of-equations two-stage DEA approach for explain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27(1):25—43.
- Kirkley, J. et al(2002),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common-pool resource industries: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2(1—2):71—79.
- Lazkano, I. (2008), "Cost structure and capacity utilisation in multi-product industries: An application to the Basque traw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conomics* 41(2):189—207.
- Ljungwall, C. & P. G. Tingvall(2015), "Is China different? A meta-analysis of the growth-enhancing effect from R&D spending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36:272—278.
- Maskus, K. E. (2010),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novation in services",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 Trade* 12(8):119—129.
- Pascoe, S. & D. Tingley(2006), "Economic capacity estimation in fisheries: A non-parametric ray approach",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8(2):124—138.
- Pilat, D. & A. Wölfl(2005), "Mea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No. 2005/05.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Overcapacit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Backward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XUAN Y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backwardness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manufacturing overcapa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distortions of factor prices giv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iority to obtain productive factors, which erodes and squeezes the essential inputs needed by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itutional overcapacity caused by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not only restricts the effective demand of high-end services, but also inversely increase factor markets distortions due to overcapacity and further reduce the supply of essential element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and a reference for policies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Keyword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Overcapacity;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es; Backwardness of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陈建青)

(校对:孙志超)